

編 者 按

本期「百年中國」發表的三篇論文的論題、視野和方法雖各不相同，但是都涉及中國社會組織結構的性質以及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的關係問題。

西村成雄一反日本史學界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力圖揭示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在巨變中的連續性。為此，他發明了一些新詞彙，用三個政治空間的重疊來解釋鞏固國家權力與消解國家控制的社會運動之間的複雜互動。表面上看，社會運動（作者稱為「國家向社會的凝聚」）和國家權力（作者稱為「社會向國家的凝聚」）是互相矛盾的，兩者在二十世紀中國交替出現。但每一次社會運動都導致民族國家力量的擴張。它是不是和中國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及中華帝國的文化有關呢？

劉創楚的論文力圖用社會學調查數據來解釋中國當代的社會分層。他認為，中國傳統紳士階層的分崩離析，實際上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動盪不已的原因。本世紀50、60年代中國社會分層不明顯，但政治運動則風起雲湧。他認為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分層，特別是中產階級的形成，有助於中國社會的穩定。

王毅通過「中央文革小組」在文化大革命中興起和運作模式的研究發現，它同傳統王朝的內廷或者皇帝為了控制官僚機構所依靠的私人班子十分相像。號稱全盤反傳統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反而顯示出幾千年傳統官僚體制和王權關係中的一些重要結構，這是頗為弔詭的。